

民间历史文献示例

论柔佛州峇株巴辖益群书报社的功能、发展与转型 (1910-2015)

The Aik Koon Chee Poh Siah of Batu Pahat, Johor: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1910-2015)

欧妙香*

(Eunice AW Miao Xiang)

摘要

书报社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党到南洋宣传革命时建立的革命宣传机关，它表面上是公共的阅读场所，实际上则是革命党借以宣扬革命思想之处，有些书报社甚至被充作革命党的办事处。虽然多数书报社成立的原意是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但当时书报社不仅达到这层功用，更担负了一般传统华人社团的职能，对社会做出许多贡献。书报社的成立不只是部分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在马来亚的展现，也是时代背景下特殊的历史产物，无论对中国或是马来亚而言，它都极具历史意义。然而，随着书报社纷纷倒闭，这个组织如今在华人社团中几乎是被遗忘的，现在一般对书报社的讨论，也仅将书报社放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去谈，而忽略了它作为传统华团实际承担的多元功能。目前尚无专著对书报社这类组织进行专门论述，因此本文拟以柔佛州峇株巴辖益群书报社为个案，探讨书报社从1910年到如今的发展、角色功能与转型，以期对书报社在马来西亚的创立以至发展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关键词：益群书报社、华人社团、功能、转型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ee Poh Siah* (reading club)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of China was a centre to propagate the ideas of revolution. The reading club was not only open to the public, but was also the office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lthough most reading clubs were designed to disseminate Sun Yat-Sen's ideology, they were also meant to function as association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Most reading clubs closed down because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were largely forgotten by the public. A few studies completed on the reading club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ir connection with

* 欧妙香 《东方日报》记者。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电邮地址：euniceaw07438@gmail.com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ir role as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the community were neglect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ik Koon Chee reading club of Batu Pahat to examine its function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1910 and 2015.

Keywords: Aik Koon Chee Poh Siah, Chinese association,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一、益群书报社的创办背景与组织结构

益群书报社成立于1910年，由峇株巴辖（Batu Pahat）一群有识青年所创办。他们在1908年北上吉隆坡聆听革命演讲后，受革命精神感召，决定回家乡鼓吹革命思想，遂创办了益群书报社。创办书报社是海外各地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推广革命思想的一种途径。孙中山于1900年抵达新加坡以后，直到辛亥革命前，马来亚共成立了58所书报社。（颜清湟 1982：141-144）

孙中山于1905年创立同盟会后，便开始了他在南洋的宣传活动。他发现南洋不仅地理上靠近中国、华侨人数多，经济实力也很雄厚，能提供革命所需资源。因此，1907年后，孙中山便将革命重心由日本转向东南亚，新马更成为东南亚同盟会的本营。然而，革命派初到马来亚时，行动多受阻碍。他们不仅受到殖民地政府干涉¹，又必须与维新派势力斗争，革命情况一开始并不顺利。在革命派宣传及筹饷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屡屡遭到拒绝²，更曾受到当地支持维新派的富商动言以武力威胁³，而且，当时整个华侨社会仍十分保守，对革命多持冷淡态度。

为了唤醒广大华侨对祖国的关怀，争取底层群众的支持，革命党人在南洋举办了一系列革命宣传活动，如办报、演讲、成立书报社与剧团等，试图将革命思想渗透到低层群众之中。由于报纸、书刊、杂志的传布对象仅限于识字者与有能力购买书刊者，因此，要将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半革命性质的书报社。（颜清湟 1982：138）

书报社的成立，不仅起着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它在当时也成为同盟会政治组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执行着与当地同盟会支部相同的职能。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如峇株巴辖，书报社与同盟会分部是混为一体的，益群书报社就是党分部，执行着党分部的职能。书报社使革命领袖与群众得以接触，进而影响其思想。当时，革命派势力比维新派势力迟进入峇株巴辖，1908年创立的中华商务局（今中华商会）就是由维新派的老一辈商人领导；拥护革命派的益群书报社，则是新兴的年轻商人阶层。虽然当时双方有对立情况，但随着光绪皇帝驾崩与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维新派势力便渐

¹ 各地区殖民政府对革命派态度不同，但多数都认为革命派将影响华侨情绪，不利于其统治，因此处处制约他们的行动。孙中山在晚晴园时就遭到英政府的暗探监视，以确认其行踪，且不允许他做任何的公开性演讲。

² 革命党人邓泽如曾到马六甲游说陆佑捐款，陆佑虽赞扬革命，但不愿认捐。此外，邓泽如与黄兴等将孙中山信函转交到金宝一名余姓矿商手上时，他非但不捐更对二人恶言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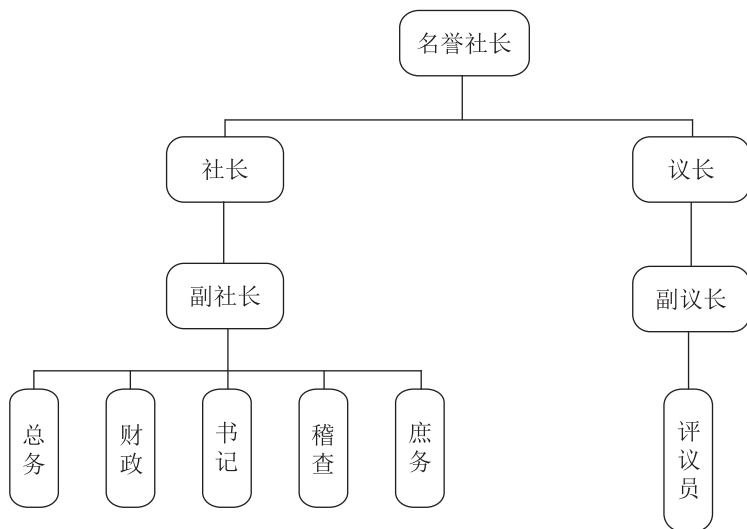
³ 当孙中山拟往霹雳怡保发展革命组织时，遇当地拥护保皇派的富商胡子春威胁，扬言欲以武力对付之。

渐消糜，峇株巴辖民众都将对祖国的认同投射于国民政府身上。益群书报社作为国民党的分部，也因此逐渐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

然而，一般论著论及书报社，都会直接将它放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中谈述，把书报社当作革命的宣传机关之一，但是对书报社作为华团的定位与组织结构则缺乏讨论。实际上，书报社与早期传统华团组织在结构上大同小异。以益群书报社为例，它在当时具备健全的组织结构与功能，独立前的定位则较模糊，直到转型后，它才有明确的定位。

据1920年《麻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所述，各界华人都可入社为社员，唯一条件是品行须端正。⁴益群书报社当时设社长一名、副社长一名、名誉社长无定额、正议长一名、副议长一名、总务一名、财政一名、书记两名、稽查两名、庶务四名与评议员20名，其组织结构如下：

表 1：益群书报社1920年组织结构表



资料来源：整理自1920年《麻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

由上表可看出，益群书报社的职务分为两个部分，即以社长为首的执行机构，与以议长为首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主要负责执行社务；监督机构则从旁督促、检查与弹劾各事项。简章中清楚列明各个职位所负责的职务，如社长代表书报社全体，负责总理书报社的一切事务；议长对外有发言权，对内则监督社长职务的运作。由此可见，各职位间的分工壁垒分明，起着相辅助又相制衡的作用。

⁴ 据1920年的《麻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入社须经社员一荐一和，填写志愿书后经过开会由众认可，一个月内无人指摘方才有效。

益群书报社的理事任期为一年，每年12月25日会以投票方式，开会选出下届理事，每名社员都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上届理事若得推选，可连任同个职务。书报社每个月会开一次常务大会，讨论社务发展状况。若遇临时事故需社员共同商议，可由一人提议，再由社长召集，开临时大会讨论之。

1920年《麻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经过英殖民政府立案，章程中也规定社员必须遵守英殖民政府定下的法律。如社员有不法行为，将开会议决并革除之以视惩戒。虽然随着时代改变，益群书报社的职位有所更动，但变化不大，仅随着社务发展另设一些专门职位或删除一些不合时的职位。从这份简章可看出，益群书报社在1920年时已经是个有系统的华团组织，且受到英殖民政府的承认。

虽然益群书报社以启迪民智、发扬文化为创社宗旨，表面上看似是以文化组织作为定位，但它成立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宣扬革命思想。民国成立后，书报社成为国民党在南洋的分部，负责执行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其性质正如吴凤斌所说，“书报社表面上是一种侨团或文化组织，实际上是作为联络华侨、宣传革命的一种机构和重要阵地。有些书报社，本身就是纯粹的同盟会分会组织⁵，但以书报社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吴凤斌 1993：503）

益群书报社在当时名义上虽以文化与教育为宗旨，也执行这些功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为革命而起的组织，也一直为革命党（后来的国民党）服务。因此，它在独立前的定位并非单一而明确的。直到1980年代，益群书报社才正式转型，将组织定位于文教与慈善事业上，它的性质才真正明确起来。

二、益群书报社独立前的发展过程

益群书报社成立于1910年，它之所以成立既是开明人士受革命演讲启发，也是受同盟会会员雷绵超与饶少庚的极力鼓吹影响。雷绵超与饶少庚在创社以前就是同盟会会员，雷绵超更曾参与麻坡启智书报社的创立。1908年，雷绵超、甄宝臣、何国旗、曾继荣、赵丽生及饶少庚等有识之士，北上吉隆坡聆听有关宣扬革命的演讲，后深受启发，决意于峇株巴辖推展革命思想，筹备两年后便成立益群书报社。

益群书报社的“益群”二字，是“广益群生”之意，与其创设宗旨相符。书报社最初的会所是在苏雅街（Jalan Soga）和苏丹娜街（Jalan Sultanah）交叉处的一间亚答屋（今日源顺油站所在地），土地是募捐而来，亚答屋则由何国旗、饶少庚、王永官、曾继荣等人承建。

益群书报社成立之初，以开通民智、举行公益为宗旨，属公开组织。由于1920年前峇株巴辖的组织并不多，都是业缘、地缘、血缘宗亲组织⁶，尚无综合型组织，益群书报社的存在突破了当时组织性质的藩篱，在团结峇株社区民众方面起了显著作用。当时书报社大力推展“识字运动”，社内置放各种书籍与报刊供大众阅读，并邀请到来演讲，借着举办这些活动以扫除文盲，启迪民智。

⁵ 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支部改为“中华革命党”，以避免被当作私会党。

⁶ 据吴华《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峇株巴辖独立前有一业缘组织、17地缘性组织、一血缘性宗亲组织。（吴华 2002：11-13）

益群书报社在当时除了负责扫除文盲及主持各种庆典外，更在1923年先后创办了培新学校（后改名为爱群小学）、圣模那培群学校、巴力加心励群学校、永平平群学校（今永平小学）、龙引育群学校（今中华小学）、中江志群学校（今中江小学）等华文学府，这些学校校名皆有个“群”字，但仅三所学校沿用校名至今。

由于益群书报社当时执行的都是利于民众的事，因此倍受峇株巴辖群众信赖，在当地声势渐起，成为峇株巴辖领导机关之一。其性质正如颜清湟的论述，“它们（书报社）致力于促进当地华侨社会内各份子共同团结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所有愿意前来阅读书报的华人，不分籍贯与所说何种方言，均受欢迎。”（颜清湟 1982：145）

1920年益群书报社发生火患，使用十年的会所付之一炬。益群书报社在当时社长何国旗首肯下，将办事处暂时移到社长位于帆加南街门牌38号的店面——“旗昌号”楼上。直至1925年，在李箕菊、曾江水、曾继荣与赵平阶等先贤等带动下，才搬迁至位于罗加雅街（Jalan Rugayah）的新会所，并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益群书报社社内尚存一块立于1926年6月6日的石碑，记载了书报社社员与商号捐助建筑会所的征信录，捐款者众多，数额由十元至一千元不等。

中华民国初立时，海内外华人仍有新旧派系之争执，在峇株巴辖就有持相反立场的中华商会与益群书报社，前者拥护以康有为为主的维新派，后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据〈中华商会之沿革及其建筑〉记载，“此时期也，适值革命潮流……峇株巴辖人士，因之角逐甚烈，会议场中，且曾一言不合，则卷袖怒目，互以墨砚为武器。”（钻禧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 1969：A6），这段话说明当时两方一触即发的对立情况。

依当时商会与书报社的理事名单看来，两方理事身份多有重叠，如甄宝臣，同时是中华商会与益群书报社的发起人，黄锡在〈纪念甄公宝臣〉一文中将此矛盾解释为“甄公……以商会之宗旨，在商言商，未便顾及其他！”（特刊编辑委员会 2000：231），认为商会最主要还是在于联络商情与发展业务，在政治方面并不十分冲突。而且，中华商会后来的政治立场也是亲国民政府，1936年商会还发起筹赈委员会，帮助中国政府抗日，其会所至今也仍高挂孙中山肖像。根据骆东顺先生的说法，甄宝臣等人是先与中华商会老一辈理事意见不合后才离开商会，创建益群书报社。

骆：……中华商会那些老的就是保皇派。

欧：所以那时候是不和的啦？

骆：是咯，那时不和就分出来咯，陈瑞和、何国旗那些就出来咯，离开中华商会咯，出来了就要做组织。刚好同盟派那个孙中山去吉隆坡演讲，中华商会那些出来的几个会员，就邀出来，一起上吉隆坡听演讲咯，鼓吹同盟会嘛，变成他们回来的时候就组织书报社。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

以理事身份相重叠的情况看来，两派当时对立情况也许并不如前所述那么壁垒分明。再者，保皇思想已随着光绪皇帝在1908年逝世渐渐失去效用，加上1911年国民政府推翻满清，民众转而支持国民政府也是情理之内的事。

随着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新马国民党支部也开始成立，主要目的是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引导侨民心向中国。然而，自袁世凯称帝，英政府便承认袁世凯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这正代表海外国民党支部将受英殖民政府的压抑。在1914至1919年间，支持孙中山领导的组织只能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秘密活动，据记录，1914至1919年中华革命党峇株巴辖分部的领导人为甄寿南与雷绵超。

直到1919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州政府，海外各组织才重新以国民党支部的名义活动。书报社在当时仍是合法社团，英殖民政府并未干预书报社活动。直到1925年，英殖民政府查封国民党，禁止国民党人在南洋活动，各分部才转入地下活动，但仍以书报社作为掩护。

1925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全国即将统一，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五三济南惨案，激起海内外华人的愤激，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爆发各种激烈的反日行动。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因担忧华侨的激烈行为将引起英殖民政府的关注与对付，即发出声明，号召华人以和平方式表达抗日情绪，引导他们齐心协力筹款，救济中国的受害者。此时，陈嘉庚以怡和轩俱乐部的名义向所有华人社团发出通知，邀请他们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中建立“山东惨祸筹赈会”，由陈嘉庚领导，这项筹赈活动总共筹获高达一百三十四万元。从骆东顺的口述访谈得知，峇株巴辖中华商会与益群书报社这两个领导峇株巴辖的机关，亦加入救济之列。

骆：以前益群书报社就有（响应）陈嘉庚咯，陈嘉庚就是我们华人的头嘛，他就做筹款委员会的主席，他就号召各地华人社团筹款了寄给他。他集中这些款项就寄给中国，他就寄去买那些炮药，对抗日本咯。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

据《中华商会钻禧纪念特刊》载，当时峇株巴辖还成立救济会与反日会，反应热烈，尤其获得商家大力捐输支持，不过筹款的数额则不得而知，记录显示所筹款项都是寄到筹赈会位于新加坡的总部。（钻禧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9：A8）直至中国与日本签订《中日济案协定》，活动才告一段落。这次筹款活动将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推向高潮，海外华侨不再像以往仅限于捐款救济各自省份的亲友，而是救济远在山东的受害者。此外，这次运动也为往后七七事变时第二次筹款运动铺平道路。

在团结抗日的氛围下，峇株华社有感长久分裂将不利于华社未来发展，以及由商会管理学校终不妥当，于是将中华商会所办的正修学校与益群书报社所办的爱群学校合并，并设立“峇株巴辖正修爱群董事会”这个独立机构统一管理学校，以正修为男校（设于今日爱群校地），爱群为女校（租用中华商会右侧之民房）。

自从1930年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担任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后，新马国民党各支部受到进一步打压。他上任后，施展高压政策压制国民党的宣传机关，使新马各支部都一片沉寂，直到1937年才恢复生气，这合理解释了当时作为国民党分部的益群书报社，为何没有首当其冲地发起筹赈活动，而是由中华商会号召发起“峇株巴辖华侨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

再者，这两个组织的领袖实则多是同班人马，由任何一方担任号召其实并无太大影响。从政策上看，在这个敏感时期，以中华商会做号召，的确是更理想的选择。据筹赈委员会的名单，担任理事的仍多为益群书报社的社员。这次筹募活动比第一次更加系统，规模也更大，峇株巴辖内尚再细分成各小区，且皆有专门负责者，筹款成绩数年来在百万以上，公债票购买也达三十万，是峇株巴辖华侨爱国的又一展现。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占马来亚，英政府见势不可为，准备撤退；另一边厢，中国正与日本开战，已是自顾不暇，马来亚华侨这时失去双边保护。峇株巴辖于1942年沦陷，英政府临退前，因不想留下物资给日本，便开放米仓，给市民自由搬取，并准市民自行疏散。当时，华侨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援，使日本感到巨大威胁，因此日军入侵后，以更高压的方式对付华侨，尤其是参与抗日筹赈活动的领袖，更成了日军首先对付的目标。在进攻峇株时，日军曾两次进行轰炸，加上采用包剿的森林战法，使得这期间许多筹赈侨领委员遭杀害。所幸益群书报社社员已在日本攻陷峇株前，将文件、理事名单、图片或相片等销毁，众多理事逃亡各地，否则伤亡人数更不堪设想。战争平定后，日本准许市民领取安居证，回到市区居住，与此同时，日本司令官佗美少将正在大肆搜捕筹赈救国余下的领袖。

在二战期间，益群书报社所遭日军占用，成为配给面包与香烟的仓库，他们大肆破坏书报社内的设施，会所遭毁损。虽然书报社与筹赈会会员名单已遭销毁，但日军仍在警探朱荣水的帮助下，查明筹赈会领袖的身份，并以商议地方善后为名义，将领袖们骗到警局，数落他们援中抗日的“罪行”，对他们严刑拷打，逼迫这些领袖招供出同党。几日后日军见威逼不果，便分批将他们载到偏僻地区用刑，先用机关枪扫射，再用刺刀刺杀，当时益群书报社的多数领袖如赵丽生、王季銮、董怡全等都惨遭日军毒手，其他侥幸存活的则逃匿他乡。

1945年日军投降后，英军卷土重来，随即宣布取消战前实施的社团注册法令，并免除所有社团注册，令各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国民党各支分部也重新恢复活动。当时，益群书报社社员盘广与粘天生积极复兴书报社，在中华商会设立临时办事处，并四处向华侨筹募复兴赞助费。他们与蔡伯祥、黄锡与张启初等人于11月15日组织复兴筹委会，讨论未来社务发展。

然而，益群书报社文书记录显示，书报社在1945年至1951年间社务并不热烈。依骆东顺所说，许多社员因在日治时期遭受身心灵创伤，造成战后人人自危，因此复社之事在当时较为冷淡。

骆：那时候开办的很少人再来，只有几个理事来这边走走、问一下。因为他们怕。有些家族的成员已经被抓去被日本杀死，他们有一个阴影，好像变成你们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

（骆东顺，访问编号：001，2016年1月11日）

原在1938年7月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组织与训练青年，使之能担任各种社会服务与抗战救国工作，才组织起来的⁷。（崔贵强 1990：30）战后，三青团在较小的市镇如峇株巴辖、东甲、古来等设立分团。据说，所有的三青团都直接向南京中央总部负责，立场唯国民政府马首是瞻。据文书记录，柔佛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曾于1946年3月17日在益群书报社举行升旗礼与干事联席会议。峇株巴辖三青团也曾发动协助捡拾被日军屠杀者的遗骨，公祭于峇属亚依淡殉难烈士公塚，参加鸣冤会。

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受马共威胁为名，在马来亚颁布紧急法令，大肆对付华侨，许多华侨团体、学校被迫停办，华侨被强制迁入集中式新村，这些举措严重影响了华侨社会，所有华团发展都处在停滞阶段。1949年，英政府下令解散新马国民党支部，国民党又同时在国共内战中失势，使海外国民党人造成冲击。

虽然如此，在台湾国民政府积极策划与鼓励下，当时海外国民党仍以不同的名义和形式继续活动，如渗透入全马各地的社团组织。英政府因企图以国民党势力制衡马共，所以对这些活动采取不干预政策，直到1950年初，英政府在外交上承认中共，正式查封国民党，各支部才转入地下活动。

在同时期，新马党人为了笼络民心、拥护国民党政府，每年都庆祝重大节日，如双十节国庆日、蒋介石寿辰与复职等。国民党人所做的努力，除了让大众知道国民党的残存势力仍存在以外，并无取得什么实质效果。1950年开始，台湾当局便争取海外学生到台湾各大专学校深造，侨务委员会负责对外的联系工作，教育部则负责安排侨生入学及生活等事宜。

在1940年末至独立这段期间，益群书报社刚从战火中复苏，社务寥寥可数，每年除了在重大节日如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国父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等，发出通告号召全峇华人升旗庆祝，或举行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21周年纪念会以外，就只负责受委保送峇株巴辖华侨中学毕业生赴台深造，此外再无其他活动，与国民党政府仅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而保送一职，直到1960年就转由中华公会负责。到了1957年，马来亚独立，益群书报社与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与中央侨务委员的联系也停止联系，历史使命基本上已告一段落。

三、益群书报社独立前的角色功能

益群书报社创立之始，虽负有鼓吹革命思想的使命，但创社以来，书报社仍以社区为主要关怀，积极举办各类活动以团结峇株巴辖华侨，与社区保持紧密互动，成为当时社区具影响力的社团之一。书报社在不同时期功能有所转变，以下将以1957年马来亚独立为分水岭，分而论述。

在吴华看来，“早期乡团组织的功能是：救济贫困的同乡，和协助同乡就业。继而，创立庙宇，开设义山，兴办学校教育子弟，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支持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到1940年代，则支援抗日战争，筹赈救亡。”（吴华 2002：1）这与1920年《蕨

⁷ 国民党与三青团虽是两个分开的组织，实则负起共同的任务，党着重于政治方面，团负责教育方面，对象多是青年学生。（崔贵强 1990：30）

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中所叙述的创设宗旨与责任大同小异。据《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益群书报社在当时的宗旨为“开通民智”、“举行公益”，社员负有以下四责任：

- （一）有互相劝勉，各守正业之责任。
- （二）有开导侨胞，共趋文明之责任。
- （三）遇本国或外国，发生灾难事，有募捐救济之责任。
- （四）对于侨胞，遇有商场纠葛交涉事故，有维持和平，共同排解之责任。

归结以上四点，可看出益群书报社初创立时，它的角色功能大致上与当时传统乡团相同，主要还是联络乡谊及为社区华侨服务。其功能有如下四点：

（一）社区的文化中心

从中国南来的华侨大多目不识丁，民族观念与政治意识也非常淡薄，他们被当成苦力贩卖到马来亚后，多数时间都在赚钱糊口，根本无暇忧虑教育问题。当时英殖民政府并无在马来亚设立任何公共图书馆，因此各地书报社的成立，就成了各社区的文化中心，让当时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有了一个能吸取知识与提高教育水平的场所。书报社内置放各类书报供大众阅读，虽然多数都是革命书报，但仍能使民众接触知识，这是书报社最直接而原始的功用。

益群书报社创立之初，除了让群众前来阅读书报，也大力推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也常在社内主办演讲以破除迷信。此外，书报社也曾推动“文明结婚”，即对旧社会的传统婚礼加以改良，成为较简化的西式婚礼。

欧：……文明结婚是怎样讲勒？

骆：啊就是来这边做这个……不是像以前我们穿那个马褂，还有什么古代的……我们现在不是穿那个婚纱咯，就是以这个叫文明嘛。以前我们中国来不是要盖那个红红的巾，穿马褂旗袍还是什么？

欧：所以书报社就是有要改革那个结婚啦？

骆：是啊，书报社就是第一个嘛……其他的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做这个东西就不知道。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

从《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可知，到益群书报社行文明结婚礼，可获十元赠助。虽然关于文明结婚的资料已无从挖掘，但据《孙中山与柔佛》中对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的简史叙述，该书报社也有替民众办文明结婚礼。在《中华商会钻禧纪念特刊》中，也曾提及谭云山在1928年与爱群女校校长陈乃畏结婚，地点就在益群书报社。

开启民智是书报社推动文化的第一步，进一步延伸就是书报社后来的兴学之举，书报社的文化功能印证了郑良树所说的“除了宣传革命思想之外，在推动中华文化以及提高知识水准方面，这些无数的‘文化中心’及‘中华文化传播站’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郑良树 1998：137）

（二）教育的推动者

20世纪初，英殖民政府虽然不阻止华社开办教育，但当时华社并无办学经验，因此当时的教育也仅限于照搬中国的旧式教育，直到维新派与革命派到南洋进行宣传，才真正建立起华侨的民族意识，继而引领华社进入办学热潮，情况就如郑良树所说“只要有水井之处，必有华侨；只要有华侨之处，必有华校。”（郑良树 1998：162）

益群书报社身为革命党的一个重要机关，为了激起华社的民族意识，除了积极推展识字运动，也努力推动教育。书报社第一所参与创建的学校，如前一节叙述，是接办经费困难的培新学校。当时培新学校因缺乏有钱势的董事会支持，面临经费问题，于是益群书报社一群理事发出号召，接办培新，并将之易名为爱群学校，使学校免除了关闭的命运。

此后，益群书报社更先后创办了圣模那培群学校、巴力加心励群学校、永平平群学校（今永平华小）、龙引育群学校（今中华小学）、中江志群学校（今中江小学）。在1940年时，书报社社员也协助筹办峇株巴辖镇上第一所华文独中，即峇株巴辖华侨中学（今华仁中学），虽然益群书报社所开办的学校政党性质浓厚，却为推动华文教育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此外，在益群书报社尚保存的书信中，也显示学校与益群书报社的联系深厚，除了各地学校频密地向书报社要求捐款以外⁸，吉隆坡中华中学也因日治后要出版复校特刊，欲刊载各区复校情况而写信给益群书报社，要求书报社填写峇株巴辖区学校状况。由此可看出，益群书报社当时与峇株巴辖华教应是起着直接联系，学校才会致函书报社，要求书报社代为整理区内复校情况。

（三）仲裁与协调功能

由于独立前英政府在马来亚主张分而治之政策，因此当地华侨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华人社团则负责管理华侨社会事务，虽然后来英殖民政府开始管制这些权力，但一般上华团在华侨社会中仍深具影响力。然而，要能管理与协调社区大大小小的事务甚至纠纷，调解者必须是个具有公信力与影响力的个人或机关，才能使民众愿意将权力交付该个人或机关，并信服其仲裁结果。

骆：……所以有时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他们邻居有吵架还是什么，有时不可以解决，就是下来书报社投诉，由益群书报社领袖去解说、解围咯，做和事佬咯。

欧：就是当时有帮人家调解纠纷啦？就是在日本入侵前？

骆：啊。以前很多这个事情办，不能解决的，都是来找益群书报社解决咯。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

从益群书报社独立前的来往信件与骆东顺的口述历史可以得知，益群书报社在独立前也负责仲裁与调解当地华侨纠纷。在益群书报社来往书信中，有一封是益群书报

⁸ 如正修学校曾在复校以后，曾致函书报社要求捐献儿童节恩物。

社社员蔡伯祥的来函，要求书报社代其向政府提出证明，帮助他解决房子遭人侵占的事件。

而社内负责仲裁纠纷的领袖，自然必须是德高望重，备受当地民众推崇的人物，民众才会服膺于他的安排。如益群书报社的领袖赵丽生，除了是益群书报社创办人，同时也是国民党柔佛支部执委、柔佛华侨总会副主席、中华商会会长、广东会馆会长及柔佛太平局绅等，具备多项身份。赵丽生不仅活跃于各商界与社团、热心公益事业、与英政府关系良好，而且在峇株民众的心目中具相当分量，是峇株巴辖有名的抗日侨领。史料记载他“素为侨众所推动，故人多以先生二字称之。”（特刊编辑委员会 2000：229），可见他当时在峇株巴辖的地位之崇高。

在黄锡〈纪念甄公宝臣〉一文中，也记载了益群书报社领袖甄宝臣曾成功出面调停华侨内部纠纷的案例。该文描述为“他也为地方上华侨同胞排解纠纷。当时陈姓与林姓同胞发生殴斗事件，拿督孟达拉鲁哇⁹即请他出面调解，平息了纷争。”（特刊编辑委员会 2000：231），此外，从文中还可得知，当时各族都是分而治之，由各族领袖负责管理自身族群事务，如拿督孟达拉鲁哇（Dato Bentara Luar）虽贵为峇株开辟功臣，地位颇高，但他并不插手华侨内部纠纷，而是请甄宝臣代为调解。而甄宝臣有能力调停两姓同胞间的纷争，足见他在当时华人社会的影响力。

（四）国民党分部

辛亥革命前，益群书报社是革命派属下的革命机关，革命后益群书报社便继而成为国民党分部，其职责主要是向民众阐扬三民主义思想，通过歌颂孙中山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的丰功伟绩，提高国民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与地位，替国民政府争取华侨的支持。每逢孙中山的诞辰或忌日、蒋介石寿辰、双十节等，益群书报社国民党各分部都要负责筹划各自地区的庆祝活动。

据《麻楮吧辖益群书报社简章》，每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国庆日及各大纪念日，益群书报社都会派发传单，邀集峇株巴辖全体华侨，升国民党党旗并开大会庆祝。骆东顺先生对此情况也有描述：

骆：以前你看峇株那个时候，10月10号国庆日的时候升国旗，就是升中华民国的国旗。

欧：几时的時候？

骆：那时还没有513的时候，日本还没有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街道全部都是升那个国旗，每个家庭都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

据骆东顺所说，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中国国民党党旗，只要一到国民政府各大纪念日就会升旗庆祝，显示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对马来亚华侨影响之深刻。

⁹ 拿督孟达拉鲁哇（Dato Bentara Luar）是开辟峇株巴辖的功臣，原名为Muhamad Salleh bin Perang。

此外，当时华侨虽身处异乡，但对中国的政局仍非常关心。资料显示，益群书报社在七七事变以前曾多次参与筹赈活动，如筹赈黄河水灾、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1936年7月下旬，中华商会组织峇株巴辖华侨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主持一切筹赈事务。当时，益群书报社碍于英政府政策，不能亲自组织这次活动，但从委员名单中可看出，益群书报社理事多数都是此次委员会的重要参与者。

四、益群书报社的转型定位——文教与慈善机构的重新出发

益群书报社在1989年时重新整顿社务，将社务重新定位在文教与慈善事业上，成功延续了其组织寿命。益群书报社的转型举措，有其特定历史原因：二战前新马地区与中国关系密切，当地华侨中华民族主义浓厚，仍以中国为最终依归，因此当时亲国民党的书报社普遍受到认同。然而二战后至马来亚独立这12年期间，马来亚与中国双边的政治环境皆急剧转变，使书报社早期的角色与功能渐渐不再适用，开始出现定位模糊的窘境。当时许多书报社也随着历史使命的完成而关闭，益群书报社则是少数通过转型，留存至今的书报社。

战后十余年间，华侨在政治上逐步认同马来亚，以马来亚为效忠对象，华侨更在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协助英殖民政府剿灭马共并通过宪法途径为华人争取各方面的权益，联合其他民族一同争取马来亚独立。到了1955年，马来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华人必须积极争取公民权，才可在独立后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同年，中国政府改变华侨政策，不再承认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这使他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多数华侨这时已对马来亚产生认同，于是舍弃了自己的中国国民身份，选择成为马来亚居民。

同一时间，中国正爆发国共内战。1950年国民党失势退守台湾，打击了海外国民党党员的士气。随着国民党力量式微，又受紧急法令所限制，益群书报社社务停滞不前。1950年，英殖民政府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明令查禁国民党组织，进一步打击了海外国民党人的势力。益群书报社名下的国民党与三青团分部被迫解散，转以地下形式与国民政府联系，但因益群书报社运作惨淡，因此二者联系并不紧密。随着益群书报社与国民政府的联系越来越少，它们的关系最终无可避免走向终止。

在马来亚走向独立、中国国民党势力式微的历史进程下，华侨本土意识已增长，开始对马来亚产生本土认同，益群书报社这类以革命及效忠党派为目标的组织，必然会受到严重冲击与影响，因此书报社要继续留存下去，就只得在这些变动中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整合与改变，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书报社后来的转型。然而，在独立后的十余年间，益群书报社并无立刻进行转型，而是处于冬眠状态，完全无任何活动，峇株多数华人社团在这段期间也寂静无声，不是处在冬眠期就是低调运作，这与骆东顺先生所说的情况“过了独立了，和平了，过了几年，（政治部）不是说每天来，有时他想到了就来调查一下。有时你这个书本他们就来看看一下。哦，以前书本拿来那个共产还是什么，像《毛语录》看到就叫你收起来咯。”（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有关，即当时华人社团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

直到1970年代，书报社才渐渐恢复运作，但社务仍持续冷淡，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活跃。据1988年书报社的会议记录，当时理事议决要求书报社活动不涉及政治，并继续以推动文化、启发民智为宗旨，这就是后来书报社重新转型，以文教慈善作为定位的基础。1989年益群书报社理事会改选，议决将社务转型定位于文教慈善事业上。

益群书报社转型后首先发动“清寒学生借贷课本计划”，这也是书报社如今唯一仍在执行的计划。这项计划是每年借贷独中课本给家境清寒的独中生，开放给初一至高三学生，华仁中学一百个名额，新文龙中华中学与永平中学则各五个名额，只要品行优良者即可申请。骆东顺道出当时这项基金的缘起：

骆：啊，没有办。1980多年就做筹款咯，在那个李孝嘉……那时候因为我们社长杨喜升代表进去五校董事会。

欧：他代表益群书报社进去董事会？

骆：他就是看到学生为什么这么少，五百多位，他就是说华仁中学就是华社办的，那学生那么少来讲，学校哪里有机会去维持，所以就是来这边讲起，开会的时候提起咯，说现在华仁中学学生那么少，如果收入不够来讲学校一定会停办，这个华仁中学是华社办的，你给他停办了那个准证给他拿去，你就要申请政府就比较麻烦了。

欧：嗯，对。

骆：那就是说，我们来筹一个款项，给清寒学生来借贷。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2016年1月11日）

据骆先生所说，这项活动由当时社长杨喜升提出，当时杨喜升眼见峇株市中心唯一一所独中——华仁中学就读人数不多，恐学校难以支撑，便在1989年2月1日书报社开理事会时，提出“独中清寒学生借贷课本计划”，获众理事支持。杨喜升、林日涌、骆东顺与李维回负责组织“筹募华仁独中清寒子弟借贷课本群星晚会工委”，成功在两个月内筹到了六万多令吉借贷课本基金。

这项计划的成功，有赖于峇株商家兼益群书报社名誉财政李孝嘉的支持，他的儿子李毅楠免费借出太子戏院场地一晚，让书报社一晚举行两场群星晚会，该晚会于5月1日举行，共筹获六万令吉，扣除成本费用一万令吉，总共是约五万令吉。书报社理事将这笔钱存入银行定存，利息便作为借贷课本计划的资金。此外，峇株巴辖商家偶尔也会帮忙书报社义卖筹款等，以及热心人士的乐捐，这些款项都是书报社主要的经济来源。

借贷课本计划推行至今已有26年，借贷课本人数达8,000人。每年年尾学生归还借书以后，就需检查书本情况及处理贷书申请等，几乎每年都会在12月25日当天举办分发课本，因此年尾是书报社最忙碌的时候。然而，当初借贷课本计划一开始并不十分受落，据骆东顺所说，这是因为当时课本价格不贵，多数家庭尚负担得起，且家长多不愿面对申请手续上的问题。直到后来课本价格趋贵，经济又不景，向书报社借贷课本的人数才逐年增加。

2008年时，借贷课本人数首度超过益群书报社所规定的100个名额，且借贷课本计划人数逐年增加，自此以后该社每年都要进行筛选工作，主要以学生家境与品行为主要考量，有专门的教育组负责审核工作，骆先生则负责核对交上来的申请表格。

骆东顺先生指出，书报社每年都会向华仁中学属下的伏龙商店购买新课本，每年花费在采购新课本的价格高达两万令吉，这也是经费本就不足的书报社每年都得面对的一大问题。益群书报社除了定存以外，再无其他固定收入，因此每年还是得到处筹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书报社在2010年开始向借贷课本学生一次性征收50令吉，作为借贷课本基金，但这仍无法填补每年两万令吉的采购课本费用。此外，华仁中学的高中分为理科、商科及文科等，每科所用的课本不尽相同，而书报社又未能掌握学生的科系分布，因此在采购课本上也会遇到难题。

除了借贷课本计划以外，益群书报社曾在1990年代与其他社团联合举办多项活动，如书法班、文艺讲座会、书展、瓷器展览会、“想当年，说峇株”讲古会、图书管理研讨会、全峇中小学生华文现场作文比赛、全峇华小六年级华文作文辅导等，然而，据骆东顺所说，这些活动都因为资金不足及无人参加等故而不再举办。

五、结语

益群书报社是全马如今少数的书报社之一，建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一般在辛亥革命前设立的书报社，都已随着时代及历史使命的完成宣告解散。益群书报社能在1980年代通过转型留存至今，证明它转型所取得的实质成果是正面的。益群书报社转型后，不仅延续益群书报社一向来为大众服务的宗旨，这也确实使它在1990年代重新恢复生命力，成功延长了它的历史寿命。同样地，麻坡启智书报社与马六甲明星慈善社¹⁰也是透过转型，存在至今。

益群书报社的转型，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因为书报社亲中国的出身与意识形态与马来亚独立是背道而驰的。马来亚迈向独立的同时，代表着书报社正渐渐丧失原本的政治功能，因此，书报社唯有顺应时代转型，才可扭转它因丧失功能而遭淘汰的历史命运，继续行驶新的使命。

然而，益群书报社如今在运作方面面临种种困境。首先，书报社的文教与慈善功能现已渐渐被资源更丰富的政府组织与华人社团取代，缺乏必要性与独特性，使书报社如今缺乏明确的入社宗旨与使命，难以吸引新社员加入。此外，书报社领导层大多又无太多时间与热忱经营书报社，导致组织缺乏活力与向心力，无法吸引年轻一辈加入社团，使社员人数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许多华团组织这几十年来为了继续求存而不断进行整合，如血缘、地缘与业缘组织，都会组织联合会以扩大自身力量。但是，书报社本来是一个以革命为纽带组建起来的社团，随着国民党势力的衰微与马来亚独立，这个纽带正式宣告瓦解，再加上许多书报社完成自身使命后纷纷关闭，导致数量减少，因此它们在战后难以有任何的集体整合动作。以益群书报社为例，它在马来亚独立后就不曾与其他书报社有密切联系，而是个别存在的团体组织，缺乏凝聚力。

¹⁰ 启智书报社成立合唱团，明星慈善社改为殡仪馆。

再者，益群书报社无恒产收入，仅靠着银行定存与社会人士的善款维持运作，又缺乏社会支持，长期受经费不足问题困扰，这也是它目前最大的隐忧。一旦资金用尽，书报社能否继续生存将成为一个问号。此外，益群书报社从1910年至今，一直是供民众阅读的场所，但由于书报社缺乏电子化的图书管理，无法系统管理藏书，导致社内无法有效整理藏书，来阅读的民众如今寥寥无几，许多珍贵史料亦逐渐散失，这些问题导致书报社现今又面临另一个困境。书报社若要再支持下去，除了需要大众集体关注与支持，恐怕书报社还要再一次整顿与转型，紧扣现今社会需求再出发。

参考文献

- 安焕然、吴华、舒庆祥编著，2012，《孙中山与柔佛》，柔佛：南方学院出版社。
- 崔贵强，1990，《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 林贵民，〈让更多学生受惠，冀续办华小作文辅导班〉，《星洲日报》（大柔佛），2001年12月24日。
- 林水壕、骆静山合编，1984，《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002，2016年1月11日。
- 骆东顺，访问编码：001/002，2016年3月8日。
- 《南洋商报》，2000年8月19日。
- 《南洋商报》，2015年12月28日。
- 石沧金，2013，《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特刊编辑委员会，2000，《峇株巴辖益群书报社九十周年社庆特刊》，柔佛：益群书报社。
- 王雪玲，2015，《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研究》，福建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 吴凤斌，1994，《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吴华，2002，《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柔佛：陶德书香楼。
- 谢立娟，〈到益群书报社寻古〉，《星洲日报》（大柔佛），1995年8月18日。
- 《星洲日报》，1989年12月3日。
- 《星洲日报》，1990年6月11日。
- 《星洲日报》，1995年8月17日。
- 《星洲日报》，2000年5月10日。
- 颜清煌，1982，《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
- 颜清煌，1992，《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小教师总会。
- 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钻禧特刊编辑委员会，1969，《中华商会钻禧纪念特刊》，柔佛：中华商会。